

近代中国文物普查史略

史勇

日前正式启动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通过常态化的文物普查,有助于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大数据库和动态管理机制。考之史料,晚清民国时期曾多次开展不同类型的文物普查,折射出近代中国风云变幻与文物保护多元面相,对于当代中国文物普查工作亦有参考价值。

一是全国性文物普查。清末内阁民政部于1909年颁布《保存古迹推广办法》并附制式表格,咨行各省以州县为单位调查古迹古物。普查范围包括帝王陵寝、先贤祠墓、名人遗迹、金石美术、古城邑及其他古物。普查时间节点截至1908年底,要求碑碣、石幢、石兽、造像、石刻、摩崖等须查明现存地点、字迹数量、有无残缺残缺情形;壁画、雕刻、塑像等须查明时代;陵寝祠墓须查明真伪。普查启动后不久即遇改朝换代,“中更事变,册报尚稽”,但仍有个别省取得一定普查成果,如山东省调查登录陵寝祠墓1420处、名人遗迹870处、金石美术2496处、古城邑及其他古物671处(件)。1916年,北京政府内务部印发《内务部为调查古物列表报部致各省长(都统)咨》,强调:“将以谋全国古物之保存,自当以分类调查为起点……兹特循国情,特别调查表及说明书,咨送查照。即希通飭所属认真调查,按表填注,限期送部,藉便考查。”普查范围包括建筑、碑碣、金石等12大类,文物调查表列有名称、时代、地址、保管、备考5个栏目。由于北京政府实际控制地区有限,最终将文物普查结果报部的仅有京兆、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省。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行《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随后以“名胜古迹古物、关系民族文化至为重要……制表通行查报”。截至1933年底,“经叠次催报在案”,共有25个省市将普查结果和部分古物照片及金石拓片报部,全国计有名胜古迹10615处,古物5352件。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成立于后,于1934年11月呈请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对所辖区域内公私古物、未登记古物和出土古物,按照统一格式填报,并于次年1月颁发古迹古物调查表及古物保存机关调查表;截至1936年6月,共14个省市将调查结果报来,后因时局变化,未能克尽其功。

二是区域性文物普查。《河南保存古物暂行规程》将全省文物普查划分为长期调查、定期调查、特别调查三种形式,“长期调查以劝学员教育会县视学员分任由县行政长官督率之,定期调查由省视学于视察学务时兼任之,特别调查由省行政长官遇必要时临时委派”“由行政公署按照古物种类制定调查表发交各调查员按期调查呈报”。《山西省各县历代先贤遗迹及名胜古迹古物保管办法》规定两县共有之先贤遗迹及名胜古迹古物分别登记,共同管理,已经调查登记之文物,每年由各县分别登记总表呈报省政府备查,文物普查结束后新发现之文物“其重要者专案报查,普通者汇入总表报告”,发现文物者不向县府报告登记或经县政府调查犹免隐匿者,分别予以相当处分。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建立了

文物普查年终报告和检查复核制度,《甘肃省古物保管办法》规定本省保管之古物每年年终应由省古物保管委员会检查一次,依照中央规定表式填具表册,分报省政府、教育内政两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广西名胜古迹古物保管暂行办法》规定各县行政官署或名胜古迹古物保管委员会每年应将管辖区域内之名胜古迹古物填表二份,分呈省政府及省立博物馆。《贵州省名胜处所保护管理办法》确立了文物资源动态调查登记制度,规定各名胜处所之所有物有变动时,由各该处所住持备具详细清册,呈由名胜保管委员会转报民政厅存案。《陕西省古物保存办法》明确了文物普查督导机制,规定省古物保存委员会须将登记意义与手续编印说明书并制定古物调查表,派员前往调查并劝告依法登记。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39年11月发布《为调查古物文献及名胜古迹事给各分区专员各县县长的训令》,制定古物、文献、名胜古迹调查表三种,印发各县,“仰该专员、县长转发所属各区、乡政府机关,着手调查,依表填记,统限于本年底查填完竣,汇集呈送教育厅”。

三是沦陷区之文物普查。台湾日据时期多次开展文物普查。据林一宏《台湾地区文化资产保存历程概要》一文研究,岛田定知1901年编纂之《日本名胜地志》台湾之部列入台湾地区史迹名胜203处,安江正直1907年受台湾总督府之命开展台湾地区历史建筑调查,杉山靖宪1916年受命编纂之《台湾名胜旧迹志》收录名胜旧迹331处。1915年,台湾总督令各地方开展名胜旧迹调查,查明全台有名胜旧迹567处(其中旧迹279处)。另据史料记载,20世纪30年代,台湾总督府设置专门调查委员会,任命台北帝国大学相关领域教授进行文物普查;在此基础上于1933年、1935年、1941年分批公布包括29项史迹、19项天然纪念物在内的所谓“国家级”史迹。1935年和1936年,日本殖民当局编印史迹调查报告两卷,分批公布台湾“地方级”史迹共80处。伪满洲国于1935年至1937年组织开展文物普查,古迹普查范围分为古城寨、庙宇、古坟墓等21大类,古物普查范围分为碑碣、金石、石造像等14大类。吉林、龙江、黑河、三江、滨江、间岛、安东、奉天、锦州、热河10省和新京特别市共96个市(县、旗)调查登录古迹707处、古物314件。汪伪政府于1940年4月至1941年6月组织开展文物普查。广州市、汉口特别市、上海特别市、南京特别市、安徽省、浙江省(杭州市区除外)、江苏省等省市共调查登录古迹670处,古物194处、陵墓227处。伪兴亚宗教协会于1942年开展华北地区文物普查,分别对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苏北)等省和北京、天津、青岛特别市境内文物古迹之名称、地址、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登录,计有文物古迹1572处(件),其中古建筑877处、陵墓259处、金石228件、陶器4件、美术品113件、礼器14件、兵器3件、古树木7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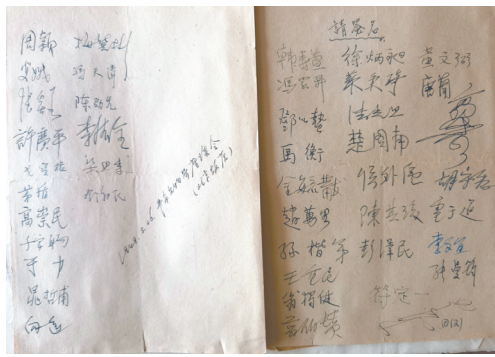
四是专项文物普查。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总会以

河北定县(今河北省定州市)为试点开展平民教育实验区建设,其中基础性工作之一就是以对农村庙宇为代表之乡土建筑遗产进行专门普查。普查范围定为定县东乡乡域内62座村庄,普查成果显示,此地原有庙宇435座,房屋899间,普查时犹存庙宇104座、房屋171间,供奉神祇共38种435个。其余331座庙宇或神像已毁,或房屋改为他用,或尽被拆毁。至普查时,“过半数村庄已没有一座庙宇”。1931年至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由法式部主任梁思成、文献部主任刘敦桢领衔,“每岁春秋二季,社员分组出发调查”,先后20余次调查古建筑2700余处,测绘206组,完成测绘图纸2000余张,刊布论著80余篇,涉及北平、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浙江等省市,基本涵盖了此区域内的重要古建筑。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营造学社对于昆明、大理、丽江、楚雄、宾川和成都、彭山、新津、灌县等地古建筑特别是传统民居进行系统普查,积累了大量宝贵资料。1934年11月,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牵头,会同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南京市社会局、南京古物陈列所共同组织南京古迹调查委员会,分为三组以测绘、摄影、摹拓等手段,对南京近郊之栖霞山、青龙山和江苏丹阳县之六朝陵墓进行全面普查,普查成果汇编为《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于1936年制定《查流出国外古物办法草案》,规定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可以委托驻外使领馆、政府机关和学术团体驻外人员,对考古学术有兴趣之华人华侨对流失国外的中国文物进行调查;受托人查得之古物应填写制式调查表格或书面报告概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可以指明某项古物委托专人调查,费用由官方负担。后因全面抗战爆发,此举未有实质性成果。

综观近代中国的各类文物普查活动,中央及地方政府开展之文物普查具有国(省)情国(省)力调查性质,体现了一种文化责任;沦陷区之文物普查则出于美化和巩固殖民统治之需要。其中也存在问题或不足,如受地方政府重视程度、执行力和时局影响及统计口径差异,有的普查存在敷衍交差现象。中国学者对于官方文物普查成果亦持审慎态度,如据《山西古物古迹调查表》记载,赵城县中镇庙建于隋开皇十四年,但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实地调查后认为“其实就形制上看,恐最早不过元代。”日伪政权对于沦陷区所谓的文物普查成果可信度亦有所怀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内务总务曾发布训令称伪兴亚宗教协会开展之文物普查“惟内容是否精确仍当以实地勘查为凭”,要求各地伪政府切实核对,说明有无遗漏不符情形。与此同时,他们也应看到,近代中国的各类文物普查活动亦有若干开创之处,如以县域为基本普查单元,印发制式文物调查表等原则为当代文物普查工作长期沿用;而流失海外文物专项普查、乡土建筑遗产专项普查的制度设计与田野实践,值得当代文物普查工作借鉴。

1949年『北平市文物界关于文物机关今后如何改进问题的座谈会』从泛黄的签名表谈

李守义 王立峰



笔者在收集整理北平和平解放初期对文博单位的接管与改造的相关档案中,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查阅到一份“北平市文物界关于文物机关今后如何改进问题的座谈会”的签名表。图书资料部工作人员介绍,该签名表为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原馆长韩寿萱后人提供。签名表为16开纸,纸张泛黄,共计2页。第一页最上面一行写着“请签名”,整页签满了参会人员名字;第二页有半页是参会人员的签名,签名之下写着“1949.3.16.北平文物界座谈会(北京饭店)”。

从签名表可知,这次座谈会的召开时间为1949年3月16日,此时,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简称“文管会”)刚刚完成对北平旧有文博单位的接管。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解放前夕,中共中央根据当时新解放的城市社会秩序尚未完全稳定的复杂情况,于1948年11月15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决定在城市军事管理的基础上实行军事、政治、文化等强制性的全面控制和管理,以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领导城市的军政工作。1948年12月13日,中央军委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副书记,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12月21日,“负责接管一切属于国家的公共文化教育机关及一切文物古迹”的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管会宣告成立,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教务长钱俊瑞担任主任。文管会下设教育、文艺、文物、出版四部。其中,文物部负责接管北平市内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事宜。“干部为华大(华北大学)调来,共6人,尹达(正部长)、王治秋(副部长)、于坚(秘书)、罗歌、李枫、于谷、于谷后调任新闻出版部,到平后调王毅来部”。1949年2月2日,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由郊外移往北平城内的办公住所,开始对外办公。

为了顺利完成对文博单位的接管工作,文管会入城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如设立组织机构、制定接管方针、明确接管任务、确定接管对象等。入城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了对国立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历史博物馆、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国史馆北平办事处、沈阳博物院北平办事处六家单位的接管。3月6日,接管国立故宫博物院大会在故宫太和殿召开。文物部部长尹达“宣读了由叶剑英签署的、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接管故宫的第120号令’,同时宣布接管故宫的具体政策。他在报告中强调:‘今天,军管会接管,就是故宫结束过去的坎坷历程,走上新生的开始。’接着正式宣布:‘马衡院长仍任院长,全院职工原职原薪’并要求大家‘尽职尽责,努力工作,保证文物、古迹安全。’”在接管故宫博物院之前,文管会文物部在2月13日完成了对国立北平图书馆、沈阳博物院北平办事处、国史馆北平办事处三处文博单位的接管;19日,完成了对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的接管;3月2日,完成了对历史博物馆的接管。

对北平旧有文博单位的接管工作完成之后,根据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指示,工作“由‘接’的阶段进入‘管’的阶段”,工作重心是对国立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历史博物馆及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等单位进行业务改造,关停各单位“所进行的各项反人民革命的活动”,在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了新的业务布置,使之在“人民立场新的文教方针下”“真正为人民所有,并为人民服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9年3月16日,文管会在北京饭店召开“北平市文物界关于文物机关今后如何改进问题的座谈会”。军代表为钱俊瑞(文管会主任)、尹达(文管会文物部部长)、王治秋(文管会文物部副部长),从签到表看,到会人员共计40多位,分别为:韩寿萱、冯家昇、邓以蛰、马衡、金毓黻、赵万里、孙楷第、王重民、翁独健等。从整理的座谈会会议记录可以看出,还有部分与会人员当时并未在签名表上签到,如吴晗、钱俊瑞、尹达、王治秋等。

钱俊瑞为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钱俊瑞和文管会文物部部长尹达简单报告文物部已接管的各单位情况,说明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希望大家对于人民的北平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提出改进意见。到会者对于国民党匪帮盗运人民文物一事,一致表示愤慨。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蛰提出,北平文化界人士应对国民党匪帮盗运古物提出严重抗议,发表抗议书,追究破坏古物责任,运美文物一定设法追回。对此提议全场一致通过。并推定郭沫若、马衡、王重民负责起草抗议书,于三日内完成。翦伯赞提出,文物由士大夫阶级转到人民手里,我们一定要注意普及,要做通俗化工作。最后,他提出“禁止古物出口”的主张。楚图南说,我们应该向人民政府提供意见正式成立图书文物管理机构,发掘古物在文化上的效用。田汉说:“故宫博物院一方面要为专家研究,但更重要的应使人民从故宫的一切看到历史事实,给人民以反封建与反帝的教育。”郭沫若说:“我们目前进行的战斗,一方面是军事的,一方面是思想的,今天在战争进行中进行这个取得,是有很意义的,我们在军事上摧毁反革命的力量,就目前形势看来,很快就能取得最后胜利,但在文化上思想上摧毁反革命力量,则需长期的努力。希望我们文化工作者加倍努力,取得文化上思想上的伟大的胜利。”最后钱俊瑞作了简短的结语,他希望全体文化教育学术人士,齐心协力,达到文化与军事胜利结合。他说:“文物部门与其他学术部门一样,它是属于人民的,因此,应当成为为人民利益服务的研究机关,达到‘大家所有,大家来办’的境地。”同时他表示,因为战争期间,各种意见不能完全实现,要一步一步才能做到。

对于此次座谈会,马衡日记中亦有记载:“下午一时文管会召开文物座谈会于北京饭店。主要问题为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如何改进业务。到者数十人。”

座谈会后,国立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历史博物馆及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等单位,在“人民立场新的文教方针”指导下,在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管会的领导下,加快抓业务工作的改进,先后筹办了多个新展览。8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北平四文物机关专门陈列展览》,文章写道:

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所属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历史博物馆、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等四个文物机关,于八月二十九日又有两个新的陈列室举行预展,高教会特邀专家数十人参观,以广泛征求意见。座谈会上郑振铎、裴文中、范文澜、王治秋等,相继发言,一致认为今天人民能把心爱的珍藏交给人民政府,以供人民研究欣赏,这种公私藏为公有的精神,是值得学习与表扬的。关于将来博物馆的发展,大家认为应该着重在人民的历史方面,不要只注意在帝王贵族的圈子里,以说明谁是历史的主人翁,及社会发展的专门化。并考虑将来的博物馆,是否除了保留几个最大的综合性历史博物馆外,则大量发展专门化的博物馆,以达到改变游乐场为社会教育工具的目的。按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所属四个文物机关,近来布置的几个专题陈列室如下:故宫博物院除已开辟的革命史料陈列室外,并布置了帝后生活陈列室、丝织品陈列室、玉器陈列室、禁书陈列室。北平图书馆布置了抗日史料陈列室、美帝侵华史料陈列室、中国政体资料陈列室及赵城藏经特展。历史博物馆有人民捐献陈列室与新收文物陈列室。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有历史古迹及文物建筑法式等图片陈列室。

“北平市文物界关于文物机关今后如何改进问题的座谈会”召开后,北平的文物、博物馆单位业务工作发生了根本变化,文博单位逐渐成为“以利用文物为教育人民之工具,以启发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并协助国家建设事业为工作之目标”。这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大规模开展文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海疆与内陆文化交融的实物见证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馆藏清代京族对联和绣花彩

林毅红 陈桂

在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内,珍藏有一套“孤品”——清代京族盘金绣纺织品,分别是对联和绣花彩法衣,两件为一套。之所以被称为“孤品”,是因为目前面世的极少,在京族地区难得一见,于1954年3月征集于广西防城港市。

对联长249厘米,宽48厘米,为中国传统楹联状,棉布材质,采用中国传统的“盘金绣”工艺盘绣14个汉字“藤渚雄威敬海北,螺城正统表交南”,以中国传统吉祥红色为底,黄色边框装饰,金色绣线绣制。绣花彩法衣,长110厘米、肩宽15厘米,下摆宽67.5厘米,材质、颜色和风格,均与对联一致。

京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少的一个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聚居在东兴市江平镇的滩尾、山心、巫头三个海岛。京族曾被称为“越南人”或“安南人”,瑶族称他们为“交趾人”。这是因为京族(越族)是越南的主体民族,现今居住在我国的京族,其祖先是16世纪初从越南北部的涂山(今海防市附近)等地迁徙而来。

这套文物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民族交融内涵,单从文物本身难以对其进行鉴别和解读,但通过历史文献可以了解文物背后的相关信息。

对联中的“汉字”体现与内陆中原文化深厚的渊源关系 对联分为上联和下联,分别绣有“藤渚雄威敬海北,螺城正统表交南”。藤渚,有人认为是指南越的“白藤江”,白藤江是一条发源于越南北部太平洋的水系,不仅是一条自然河流,更是一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河流。通过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历史上中原王朝曾对安南(今越南)三次用兵,三次征战于白藤江,三次折戟于白藤江。三次白藤江之战,是中原王朝由直轄到间接管辖的三个重要节点,也是中国与越南形成宗藩关系的重要节点。其中,史称“宋越战争”或“宋黎战争”,是中国宋朝与越南黎朝之间的战争,经此一役,北宋虽然丧失了直接控制交趾的机会,但迫于中原王朝威力,越南黎朝上表谢罪,并遣还俘虏,积极修复其关系。《资治通鉴·宋纪十》:“黎桓遣牙校贾方物来贡,仍为丁瑄上表,自言徇将吏军民之请,已权领南府军事,乞朝廷赐以真命”“藤渚雄威敬海北”,既表达白藤江之战中威武之气,也表达对北部中原王朝的敬畏之心。

“螺城正统表交南”。螺城,是越南一座古城遗



「盘金绣」对联

绣花彩法衣

址,建于公元前3世纪,为当时安南国安阳王蜀泮所建,《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一《蜀纪》载,安阳王姓蜀,名泮,巴蜀人,公元前257年,蜀王平定各地,自称安阳王,改国号为阇路,定都封溪(今越南福安省东英县)。公元前255年,安阳王在此地修筑螺城。螺城古迹至今尚存一些汉文对联。关于安阳王的传说,均是以中国的文化背景流传创作而成的,该传说反映出蜀国遣民南下建国,越南人以“螺城”为正统,间接认同蜀国后裔南下建国的史实。交南,越南在历史上曾称为“交趾”,在中国的古籍中很早就有关于羲叔“宅南交”,神农、颛顼、尧舜等“南至交趾”或“南抚交趾”的记载。尽管羲叔、神农、颛顼等是中国上古时期传说中的人物,但是今天仍然可以通过这些传说找到上古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和南方的交趾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史记·五帝本纪》: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东西之日所出入,莫不宾服。

绣花彩纹饰工艺与中原汉文化同源共生 从文物本身来看,绣花彩衣前片胸部正中位置绣蟒头纹,腰部绣双龙戏珠,腹部及下摆绣有蝙蝠和寿字纹、寿字纹、又称“团寿纹”。在越南封建时代,穿上印有汉字纹饰的服装,能够彰显个人的文化底蕴与儒生气度。这些纹样来源于中原,追根到底还是中华文化的缩影。

服饰下摆用盘金绣工艺刺绣有海水江崖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海水江崖纹借由海水纹、山纹组合,为古代官服下摆装饰,原寓意一统江山、江山永固,后在民间演化为吉祥纹样,并在家具、瓷器上广泛使用,是典型的中原汉文化代表。龙纹(蟒纹)、海水既有海疆文化特色和吉祥纹样组合,又有浓厚的中原汉文化影子。不同的是,这套服饰海水江崖纹中的江山纹,不是内陆中原的山形纹,而用唐山代替。有人认为是安王庙化身,是安南国历史文化在服饰中的体现,也有人认为是龙王庙,是海洋文化的体现。这些图案组合出现在绣花彩衣中,说明远在海疆的京族人与内陆中原汉文化同源共生,汉文化影响的时间较长且深刻,京族在价值体系以及思想观念上都与中华文化趋同。

绣花彩衣盘金绣工艺与汉族刺绣工艺一脉相承 盘金绣源于苏绣,是中国刺绣工艺中难度较大的技艺,由于使用金箔绣线,显得金碧辉煌,熠熠生辉,一般用于宫廷服饰或民间重要服饰的局部装饰。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馆藏这套文物大量采用盘金绣工艺,可见其来源不凡或具有特殊功用。这套纺织品所用的盘金绣,采用金线并非黄金,而是黄铜箔缠绕棉线,形成类似金线的线梗。内芯为棉线,按照纹饰图案顺着纹路进行盘制,用等距钉线固定。盘金线的材质和制作工艺也在不断地发展与演变和传播,不仅在内陆中原汉族,在广西边境的京族也使用这种特殊工艺,可见其交流之广泛。

京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高度融合的原因 京族作为跨境民族,文化因素虽然包含少量的占人文化和高棉文化元素,但文化表征与汉文化十分接近,在发展中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较大。从京族盘金绣对联和绣花彩衣呈现的显性元素可知,京族文化特征更接近于中国的汉文化,而非东南亚文化。这也说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的包容力,同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一副对联和一件绣花彩衣蕴含的厚重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信息,见证跨境民族与内陆中原在文化上的源远流长。无论是京族,还是汉族,从文物中窥见各民族之间文化的兼收并蓄,经济的相互依存,内陆与海疆的互动交流,汉族与京族之间彼此交融,在互鉴融通中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展现中华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不散的历史密码。

科技保护	环境监控、本体监测、预警评估	遗址	博物馆
科学管理	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咨询服务	发掘现场	档案馆
创新服务	科技文创、定位导览、数字化采集	图书馆	旅游景区
官方网站	官方微信	联系人:张磊 13572270596 座机:029-88346392 官网:www.microwise-system.com 邮箱:info@microwise-system.com	